

• 学术综述 •

第二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郭 常 英^① 张 朋^②

(1. 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 开封 475001;2. 安徽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关键词] 新闻史;近代社会;中国报刊

[摘 要] 近期在安徽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以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特点和报刊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为主题,与会学者交流了晚清、民国时期报刊与报人的个案探究,报刊、报刊舆论与社会历史变迁的互动研究,近代报刊生存环境与信息控制的历史研究,以及新闻传播观念史、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同时,还对多学科交叉研究新闻史等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和深入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0)12-0112-05

Summary of the 2nd Session of Symposium on Chines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 Social History

GUO Chang-ying ZHANG Peng

(1. 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2.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China)

Keywords: News History; modern society; Chinese Newspaper and Magazines

Abstract: Recently, the 2nd Session of Symposium on Chinese Newspaper and Magazines & Social History was held at Anhui University. The theme w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newspaper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es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historical. Scholars exchanged the opinion on Newspape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ress,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hange of historic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 research of th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of modern newspapers, and the idea of news media history. Meanwhile, the Symposium also study on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other related issues of news history.

由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主办、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协办的第二届“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7月24日~25日在合肥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内其他各地高校及科研机构从事新闻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以“中国报刊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研讨”为主题,内容既有对晚清、民国时期报刊与报人的典型个案剖析,也有在报刊与社会历史互动框架中对报刊衍变轨迹的考察,还有对社会历史变迁在报刊中所呈现问题的研究。与会期间,专家学者对多学科交叉研究及近代新闻史研究相关问题的讨论和争鸣,丰富了会议的气氛和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内容。

一 晚清、民国时期报刊与报人的个案探究

历史上的报刊与报人构成新闻史研究的主体。本次会议中,与会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与报人的典型个案着力最多,特别是当今新闻史中失载的、以往人们关注较少的区域性、专业性报刊,以及政论型报人之外的其他类型报人,引起了学者们的较多注意。

1. 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个案

近代中国的报刊舆论界,除全国规模的大众化报刊外,尚有大量的有特定读者对象的专业性、区域性的刊物,这些刊物往往与特定领域的专业性社会团体以及地域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安徽师范大学马陵合的《近代行业团体专业刊物的特色剖析——以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系列刊物为例》一文,选取民国时期行业类社会团体——中华全国铁路协会所创办的专业性刊物

为研究对象。作者在分析中华全国铁路协会的行业团体性质的基础上,指出其持续不断的办刊历程使刊物在行业团体的组织传播中扮演了“组织粘合剂”的角色。安徽大学蒋含平的《〈黟山青年〉与民国时期旅沪徽商的启蒙表达》一文,聚焦旅沪徽商组织黟县青年励志会创办的会刊《黟山青年》。作者通过分析刊物所传播的新式教育理念、对封建陋俗的批判以及振兴商业的设想,表达了具有近代意识的旅沪徽商的启蒙心态。西藏民族学院周德仓的《藏文报刊:大众媒介还是政治使者》一文,提出了藏文报刊发展史研究中面临的一个问题:藏文报刊在近代的兴起与发展首先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本质上是国家民族政策的产物,政治使命是其传播功能定位的核心,但同时,藏文报刊作为平面媒介,符合大众传播媒介的基本特征,是现代传播媒介的一种形式。藏文报刊的进一步发展,还应当正视并处理好这一角色与功能定位的关系问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陈彤旭的《青春身体的图像修辞:1920年代北京〈世界画报〉研究》一文,选取1926年至1932年北京《世界画报》有关运动会的新闻摄影为研究对象,试图将媒介中的体育摄影报道与青年亚文化结合考察,展现媒介“图像修辞”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这个变迁中所折射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的消长。

除专业性、区域性的报刊外,与会学者对于《新青年》、《观察》等已经得到充分研究的刊物也有新的解读视角。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韩玉茜的《论〈观察〉对新疆问题的报道》一文,选取《观察》对“伊宁事变”报道为个案,展现该刊在边疆问题上的言论立场。作者认为,《观察》对“伊宁事变”的全程跟踪报道,多出自深谙新疆情势的行家里手;相关报道和评论,在民族问题方面体现出较高的境界,指出“伊宁事变”的根本原因是野蛮残酷的特务统治,“民族纷争”不过是其形式。《观察》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下,对民族问题的分析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是该刊“自由、民主、理性”理念在这一问题上的体现。武汉纺织大学马庆的《论“东西文化论战”中〈新青年〉传播策略的变化》一文,聚焦《新青年》在“东西文化论战”不同时期的传播策略。作者认为,《新青年》创刊初期介入“东西文化论战”,其用意并不在此;而第5卷第3号起,始与《东方杂志》展开正面交锋,掀起论战高潮,属陈独秀“意

气攻讦”;成名后的《新青年》同仁,因对办刊方向产生歧见,无暇论战,不久完全淡出。《新青年》传播策略的变化折射出报刊同仁对于刊物发展之不同理念。

2. 晚清、民国时期的名报人研究

近代报刊的研究,不能脱离报刊背后的名报人、名记者及其生存的社会历史语境。一定程度上,报人、记者的传播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精神气质决定了一份刊物的格调与风貌。

与以往新闻史学界过多关注梁启超、胡适等政论型报人不同,本次研讨会上,有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市场上周瘦鹃等通俗文艺报人进行了深入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博玖的《〈紫罗兰〉与周瘦鹃的“紫罗兰情结”》一文,以时尚期刊《紫罗兰》为个案,剖析杂志主编周瘦鹃的编辑理念与其“紫罗兰情结”之间的渊源关系。作者认为,周瘦鹃的生命体验中,“紫罗兰情结”直接来自日常生活的体验和与现代社会本能的亲和,凝聚着他对商业文化的趋从、对时尚观念的追求,民主、平等的平民意识成为他生命审美的象征;而正是他的这种审美追求,转化为《紫罗兰》“日常生活叙事”的主要编辑风格。

以“报纸大众化”为办报理念的成舍我,亦是民国时期重要报人。台湾世新大学唐志宏的《成舍我与北京〈世界报系〉的创办与经营》一文,以成舍我大众化报刊的观点、行销的策略以及报纸副刊的变化,厘清《世界报系》成为北京地区最畅销报系的原因。作者认为,《世界报系》在市场运作上的成功与成舍我的创办、经营理念密不可分,这表现在:尝试将日、晚、画报三者整合成单一报系;报纸版面依读者需要,不时调整内容,随时修订不合时代的栏目;以“大众化”报纸作为办报理念,却不因此排除与精英阶层对话,报纸在保留“大众化”副刊的同时,将专业性副刊改写成大众可以接受的形式等若干方面。

二 报刊、报刊舆论与社会历史变迁的互动研究

在报刊、报刊舆论与社会历史互动的框架中探讨报刊变迁的历史轨迹,以及解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在报刊中的呈现,彰显了新闻学与历史学交叉研究特色,这是报刊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本次会议上,报刊舆论与社会历史变迁的互动研究表现在三个方面:报刊反映并引导舆论,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舆论导向角色;

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下报刊的舆论取向与报刊命运之间的关系;报刊与西学传播及报刊中的社会历史呈现问题。

1. 报刊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邵雍、王惠怡的《〈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舆论导向》一文,展现了《申报》在义和团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不同于朝廷旨意的独到见解。作者认为,《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舆论导向从主张镇压,到建议清政府停止招抚,再到议和阶段斡旋于中外之间,其整体舆论导向是否定的;这种否定态度折射了近代上海独特的历史地理背景以及城市新兴社会阶层的心态。东华大学廖大伟的《同一空间的不同办报理念——以〈申报〉对“刺宋案”的反应为中心》一文,探讨不同刊物的办报理念对于塑造报刊舆论导向的重要影响。作者在比较了上海《申报》、《民立报》、《新闻报》对于“刺宋案”的不同反应后,指出不同的办刊理念决定了刊物在同一重大历史事件面前采取截然不同的话语表述;史量才“报业史记”的办报理念决定了该报的舆论导向是以大多数民众知情权为目标;《民立报》作为政党报纸,其舆论导向常常与代表的政党利益结合在一起;“在商言商”的《新闻报》对于政治敏感话题,采取较为保守的评论态度,避免卷入政治风波。

中国人民大学王润泽的《“复调”抑或“和声”:五四运动中的日本媒体与政府外交》一文,呈现了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舆论导向与政府外交政策调整之间的互动。作者认为,日本媒体构建了自己眼中的五四运动,即欧美势力在幕后鼓动一群暴力学生发动的排日事件;日本政府对五四运动的力量估计比较保守,但在日本媒体舆论压力下,逐渐调整对华政策,媒体报道与政府步调基本达成一致。

2. 报刊的舆论取向受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影响

安徽大学王天根的《晚清维新舆论的媒介建构与报刊命运的考量》一文,试图从军政利益集团在政治变革道路选择上的歧异,考察维新报刊舆论衰变的历史命运。作者认为,以《时务报》、《国闻报》为核心的南北舆论网络,在形成整体性舆论互动的同时,也因地缘关系差异,有其各自的传播偏好:《时务报》偏向“通上下”;《国闻报》意在“通中外”。但在张之洞、李鸿章等军政利益集团干涉下,《时务报》梁启超、汪康年发生内讧,

导致其在维新舆论建构中逐步式微;而《国闻报》又因外交舆论上的反复,导致其媒介公信力的丧失。

南京大学周宁的《谣言:1919年安徽蚕桑女校案》一文,考察了安武军围奸蚕桑女校师生事件这一谣言的媒介传播过程及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心态。作者认为,首经《字林西报》报道,后经沪上各报转载的“蚕桑女校案”实为一起谣言,但公众对此始终深信不疑,直到事件“受害方”代表赴上海与报界反复交涉后,才渐渐平息。谣言的传播呈现了当时的社会心态:公众激烈和偏执的态度,既是“尊西”、“崇西”、对西方报道盲从的结果,又是对北洋军阀不满、不信任的生动注脚。

3. 报刊与西学传播及报刊中的社会历史呈现问题

北京大学邓绍根的《近代中国报刊与X射线知识的早期传播》一文,以X射线知识在近代报刊上的传播为研讨个案,分析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氛围中,X射线知识在报刊上的传播过程。作者认为,这一知识传播过程反映了近代报刊在传播世界先进科技知识方面的社会教育功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厦门大学蔡永明的《清末传媒视野中的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以〈申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以报刊所登载的评论、新闻报道为依据,考察清末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审判机构改革。作者认为,通过报刊就这一问题的报道与论述,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时人对司法改革的看法以及司法改革在各地的实际运作情况。

三 近代报刊生存环境与信息控制的历史研究

近代中国的报刊业始终处在政局动荡下运作,报刊的生存环境取决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政府通过制定新闻法规及政策规范言论取向、控制信息流通范围,而这些法规及政策的制定主要依据维护统治秩序的需要。

厦门大学曹立新的《党权、国权与业权: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新闻政策与报人言说》一文,聚焦于抗战时期新闻自由与控制问题。作者认为,抗战时期国民党新闻检查政策特殊之处在于,因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双重需要采取军事和党义的两套标准。因此,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新闻统制,不是体现在它对战时新闻中有关军事等“特殊情况”施行检查,也不体现在它对本党经营的新闻

事业进行宣传指导,而是体现在它对全国非党营新闻事业中的非军事的新闻和言论加以查控。上海社会科学院武志勇的《清末新闻出版法关涉报刊发行之律条评析》一文,关注报刊发行命脉的法律规制。作者在整理清末关涉报刊发行的法律《大清印刷物件专律》等相关律条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晚清政府法律律条对报刊的创立、发行采用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登记式办法;法律文本设计趋利避害,明确禁止有损于清政府统治和影响社会安定的报刊流传;以发行保证金制度、罚款处罚条款、邮资优惠办法以及禁止邮递的手段,管控报刊发行主要渠道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赵建国的《中国记者招待会的起源与早期形态》一文,在中国记者招待会起源及形态的史实考证基础上,探究清末民初信息控制方式与传播观念更新的问题。作者在报刊史料的基础上,认定记者招待会在清末就已经进入国人视野,清政府外交部准备添设“记者招待室”;而商界社团重视沟通报界,记者招待会的形式已经出现。记者招待会在清末民初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记者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是其社会地位上升的表征之一;但记者招待会既预示着一一种潜在的自由,又剥夺了某些权利,增添了大众媒体沦为政府传声筒与喉舌的可能。

四 新闻传播观念史、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

安徽大学姜红的《“公天下”与“公共性”——20世纪初中国新闻观念中的“公”》一文,分析了清末民初新闻观念话语中的“公”及其衍生的概念所包蕴的复杂意涵。作者认为,20世纪初中国新闻观念中的“公”,既存中国思想传统思想烙印,又吸收了西方政治思想;但在处理“公”、“私”关系方面,中西差异明显。西方公共性话语,实质是“为了私人的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私为公的基础,现代中国新闻话语则强调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与私尖锐对立,具有本土文化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报刊实践所凝聚的办报办刊的精神,构成了党报思想的理论源泉。安徽社会科学院常松的《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精神与历史启示》一文,立足于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办报实践,总结战争压力下党报办报理念。作者认为,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精神主要体现在政治坚定、导

向鲜明的党性原则;艰苦创业、乐于奉献的革命传统;贴近生活、通俗生动的求实风格三个方面。

此外,也有学者运用新闻传播理论解读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传播现象。安徽大学孔正毅的《唐代“士人行卷”的传播学解析》一文,尝试运用传播学理论对唐代富有特色的文人之间的传播现象——“士人行卷”进行解读。作者认为,“士人行卷”符合人际传播特点,其传播者是应试的士人;传播内容以文学作品(诗、文、传奇)为主;媒介载体通常是手抄的卷轴;受者主要是少数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显人和与主考关系密切的通榜者;行卷传播效果,使得一批中下层寒族士人步入政坛,改变了唐代社会的政治结构。

热烈的讨论气氛和认真的研究态度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特点。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在新闻史研究中,有关研究视角与方法问题,报刊史料的使用与考证问题,多学科交叉研究新闻史问题等,目前还有很多研究薄弱点,有待学术界深入探讨,有所突破。一些学者在会上交流了自己近期在有关问题上的研究成果,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也有不少学者积极展开学术争鸣,提出不同观点。发言涉及许多内容,如对报刊内容与社会历史语境的关系,区域性报刊的研究视角,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本土适应性,报刊史料与其他史料的不同特点和相互关系,加强新闻史学者的史学基本功,新闻史学科的核心和边界,还有新闻史与思想史,社会史结合以实现突破等问题的探讨与阐述,使与会人员深受启发。

会场上观点交锋、思想碰撞的热烈讨论,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注意到,研讨会主办方在邀请专家学者的治学背景方面,力图体现跨学科的特色,将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文化史方面的专家学者与近代报刊史方面的专家学者,置于“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这一研究主题下进行研讨和切磋。不同治学背景的学者,基于各自不同的问题关怀及解释思路,使得同一问题获得多个层面的探讨,营造了活跃的研讨氛围。关于报刊及报人的个案探究,有学者提出应加强对专业性刊物、地域性刊物的研究,以扩大报刊史的研究范围;也有学者认为,任何报刊、报人的个案研究要注意分析背后的历史语境,同时个案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针对报刊史研究中概念和理论使用限度,大部分学者主张,运用西方的

理论、概念进行报刊史研究须注意其能否与中国新闻传播现象构成对应关系的问题,应警惕研究中理论预设,避免先入为主的研究思路。关于多学科交叉新闻史研究,存在正反方面意见。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新闻史的研究缺乏厚重的历史积淀,需要借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法与成果,而近代史研究也可借鉴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理论和阐释思路。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担心,坦言跨学科研究可能使得新闻史研究的边界变得模糊,而造成新闻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关于报刊史研究史料问题,与会学者积极展开争鸣。有学者根据切身研究经历,指出报刊的报道存在真伪,征引时须注意考证;但也有学者认为,新闻史中的“史料”与历史学中的“史料”要区别看待,新闻史要追求自身史料的价值,这与新闻史学本身的特色相关;还有学者提出,报刊史研究应吸取历

史学研究的史料处理方法,在报刊报道之外注意参照档案、日记、书信等。

总之,这次“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涉及议题广泛,新材料、新视点层出不穷,学者们力图将目前的新闻史研究推向更广、更深的层次。与会期间,对于新闻史研究相关问题的争鸣,显示了研究者勇于根据研究现状提出质疑和反思。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众多学者共同努力下,新闻史学的茁壮繁荣并非遥不可及,我们也期待下届会议会出现更加丰富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0—08—10

作者郭常英,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编审;张朋,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映雪】

(上接第 40 页)

置备一切,所请军需,业已不少,不特新制者皆化为乌有,即本有之军装船只炮台,亦多毁失,从新做起,经费实属不贲。臣虽不敢因惜费而误大计,惟制造若不精良,诚如训谕,临时安能得力?而欲期精良,又非趲期可以奏功,器械即已精良,而兵多未练,有械仍同无械”^①。这样一来,仿造西方船炮就成了不急之务,清政府的出路只能是继续对外“羁縻”。明乎此,就可以理解,何以耆英对魏源提出的一套“师夷长技”主张从未置理,对法国公使拉萼尼请清政府派人赴法学习船炮的建议婉言相拒。在耆英任内,无论是两江还是两广地区,仿造西式船炮都没有取得实际进展。

笔者为回应不同意见而重新回顾史实,做出以上论述,所得的结论是:20 年前笔者提出的耆英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鼻祖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合乎历史事实、可以成立的。只要秉持从事实出发、排除臆断的治学态度,围绕耆英外交的歧见是不难缩小乃至消除的。

收稿日期 2010—07—17

作者李少军,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映雪】

①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 3 册,第 471 页。